

逢星期日出版

稿 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鄭振鐸在五卅運動中

□陳福康

歲月駸駸行。具有深遠意義的五四運動，不覺已有整整九十年了。著名文學家、學者鄭振鐸先生，是五四中心漩渦（北京）湧現出來的一代風流人物之一。去年年底，我們剛剛紀念了鄭振鐸一百十周年誕辰和為國犧牲五十周年。現在，我們要紀念五四，不禁又想到了鄭振鐸。

鄭振鐸是一九一七年從溫州到北京，年底參加交通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方交通大學前身）的招生考試的。本來，他的千辛萬苦的寡母對這唯一的兒子的期望，就是學業有成，早點找一個「鐵飯碗」，以改善非常窮困的家境。但就在此時，世界上發生了一起非常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北方鄰國俄羅斯的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由於這一歷史性大事的發生，改變了整個世界，包括中國的發展的方向，也深深地影響到了鄭振鐸的一生。儘管在當時，他是不可能認識到這一點的。早在溫州時，少年鄭振鐸已經開始讀《新青年》這樣的刊物了。而這時，他幾乎每天課餘，都要去離住所不遠的一家小圖書館看書，並在那裏認識了也是去看書的別的學校的學生瞿秋白、耿濟之、瞿菊農。他們一起談讀書體會，談國家大事，成為好友。

九十年前的五月四日那天，正是星期日。鄭振鐸沒去學校，午休時突然被門外的叫喊聲驚醒。那就是有名的「火燒趙家樓」。趙家樓離他的住處不到一箭之遙。因為當時鄭振鐸、瞿秋白等人，就讀的都不是「名校」，所以五月四日那天北京大學等校的同學們「起事」時，他們都因為沒有得到通知而未能參加。但從第二天起，他們就都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愛國學生運動。事實證明，他們幹得絕不比名牌大學的同學們差。他們創辦了著名的《新社會》旬刊（後來，許地山、郭夢良、徐六幾也參加編輯）。鄭振鐸起草了發刊詞。當時，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先生讀到這篇發刊詞，就非常重視，整篇抄錄了下來。鄭振鐸還與耿濟之攜創刊號去訪問陳獨秀先生。陳先生大為讚賞，並作了重要的指導。鄭振鐸立即根據陳先生的指示，寫了《我們今後的社會改造運動》等文。

這時，鄭振鐸還與鄭天挺、郭夢良、徐六幾、朱謙之、黃廬隱等在京的福建籍學生，創辦了油印刊物《閩潮》，還一起組織了一個「S.R.（按，即Social Reformation的縮寫，意思是社會改革）學會」。他還和北大學生易家鉞、羅敦偉等人成立過一個「青年自立會」，還和北大的羅敦偉、徐六幾、周長憲等人創刊了《批評》半月刊。他又主持「社會實進會」的講演會，邀請過胡適、高厚德（H．S．Galt）、陶履恭、周作人等人講演，講演稿大多又由他整理或加按語後在報刊上發表。他還負責「永嘉（按，即溫州）新學會」會刊《新學報》在北京出版。他在《新中國》月刊上發表過列寧的重要文章的譯文（這是最早譯成中文的列寧著作之一），還和耿濟之一起翻譯了《國際歌》歌詞（這是最早的中文譯詞）。

由此看來，五四運動時鄭振鐸的思想和行動的起點都是比較高的。然而不知道為什麼，這些史實卻長期被評論者遺忘、忽視，甚至貶低。翻翻那麼多議論五四運動的專著論

文，我這裡談到的事情，從來未見提及！實際上，鄭振鐸當時的一些文章鮮明地表現了：一、徹底的堅決的改革精神，強調舊中國必須改造；二、比較鮮明的社會主義傾向，要求創造一個沒有階級、戰爭的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嚮往俄國的社會主義；三、強調實踐，強調言行一致和從小事做起，號召知識分子到工農中去，甚至號召新文化運動者向馬克思和列寧學習；四、在有些問題上，例如關於推翻僱傭制度，關於反對軍閥辦實業等，甚至提出了一些在當時可說是石破天驚的見解。

我認為，這些，可以說就是典型地體現了真正的可貴的五四精神。當然，鄭振鐸當時也受有空想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影響。《新社會》只出了十九期，就被北洋軍閥政府強行禁止，還抓了人。同人們不畏強暴，籌備再辦一份刊物。鄭振鐸提名叫《人道》，瞿秋白不大贊成這個刊名。秋白後來回憶說，「振鐸的傾向最明瞭，我的辯論也就不足為重」，而且，瞿秋白當時也還講不清此中的道理，「唯物史觀的意義反正當時大家都不懂得」。然而，這個《人道》也只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了。

鄭振鐸一生輝煌的文學事業和學術事業，也是從五四時期開始的。他在那時開始翻譯和組織翻譯俄國文學作品，開始介紹和組織介紹西方文學理論，開始創作新詩和小說，開始編輯文學叢書等等。特別是，以他為核心，發起和成立了我國近代最大的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應該強調指出，這一切成績的取得，都與青年鄭振鐸積極投身五四運動有關。這種，還可以提出幾則重要的史實：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六日，周恩來、鄭穎超等天津「覺悟社」社員赴京，請「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團」、「少年中國學會」等四團體在陶然亭一起開茶話會。李大釗親自出席，並提出各團體應該「標明主義」。鄭振鐸是人道社負責人，又是曙光社社員。在李大釗提議下，這五個五四時期著名的青年團體隨即在北京大學通信圖書館召開代表會議，成立了名為「改造聯合」的聯絡組織。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鄭振鐸等人籌備文學研究會時，也曾借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室，即李大釗的辦公室開會議事。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日，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北京大學第二院召開第四次大會，李大釗在會上提議加強宣傳出版工作，隨即舉行團組織領導的改選，成立由十一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其中「李大釗、鄭振鐸、某為出版委員」（據當時混入會場的特務寫給北洋政府的秘密報告）。

五四前輩的奮鬥業績，當代青年是不應該忘記的；偉大的五四精神，需要代代相傳。我們的專家學者，也應該多寫一點給青年人看的通俗文章才對。這裡我不禁想到了，到現在為止似乎還沒有一部專寫五四運動的小說呢。而鄭振鐸，卻有過一部未完成的小說《向光明走》。他在一九五八年六月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信中說：「雖是斷片，但沒有發表過，是描寫五四運動的，似還可用。」後來，《鄭振鐸文集》第一卷於一九五九年十月由該社出版時，這一小說斷片首次發表。由於鄭振鐸在交稿後僅三個多月即不幸犧牲，以致人

們連該小說的創作時間也來不及問他。我認為，這部小說最有可能是一九四六年寫的。那一年，鄭振鐸集中發表了《前事不忘》、《五四運動的意義》、《五四運動的意義》、《迎「文藝節」》、《說「文藝節」》等多篇論述五四運動的文章，還為紀念五四而給《世界晨報》等題詞。看來，正是當年現實鬥爭的需要，激勵他創作這一小說的。

小說今見前六章，字數已有二萬五千多字。從已出場人物之數量之繁夥，伏筆線索之紛雜，以及場面環境之廣闊等等來分析，作者無疑是打算寫成一部長篇的。而小說正寫到微妙之處卻戛然而止，顯然因為當時作者另有更加繁忙的工作，而無暇將它完成了。從已成的章節來看，在布局結構、描寫烘托上，是十分高妙的。作品有回憶，有穿插，錯落有致。既描寫了熱血沸騰的政治活動，還描寫了心猿意馬的初戀心理，有張有弛，引人入勝。有的章節主要通过會話描寫來塑造人物形象，有的章節則主要通过心理描寫來塑造人物形象，各異其趣，均很生動。小說中作者還把自己也寫了進去。這部作品沒有最後完成，是非常非常遺憾的。

我想到，郭沫若曾經說過，要創作反映整個北伐革命的小說，「我覺得我自己是最適當的人：因為……那個巨大的波動，我是整個地參加了的。」可惜，郭沫若創作的一部反映整個北伐的長篇小說《克拉凡左的騎士》卻不幸遺失了，只剩開頭的一小部分殘稿。而如果要創作反映五四運動在北京掀起的「巨大的波動」的長篇小說，鄭振鐸無疑是最適當的人。因為他不僅「整個地參加了」這一愛國運動，而且還是一個突出的積極分子和學生代表。而其他一些著名作家，或不在北京，或沒親身參加學生運動。因此，這部小說之未能寫完，也就和郭沫若描寫北伐的小說之遺失，馮雪峰描寫長征的小說之焚毀一樣，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無法彌補的缺憾了。因而我認為，鄭振鐸的這部小說，即使僅成斷片，也仍然是值得重視的。

這裡，我還想到現在國內外某些論者的「主流話語」：「自由、民主、人權」和「普世價值」。有人鼓吹，五四精神就是張揚了這種「普世價值」，而我懷疑這種說法。我不是理論家，但回顧鄭振鐸的經歷，自己還是相信五四精神就是徹底地不安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安協地反封建主義，五四運動是俄國革命的影響下發生的。我想，「人道」、「民主」等等，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要看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場合說的，是什麼人說的，是針對什麼問題說的。要做具體的分析。當年，鄭振鐸提出辦《人道》，他的摯友瞿秋白是堅決支持繼續再辦刊物的，但不贊成這個刊名。因為，如果簡單地想用人道主義來解決社會問題，是行不通的。歷史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鄭振鐸後來也很少盲目地鼓吹「人道」。

鄭振鐸當年，受瞿秋白的啓發很多。如瞿秋白曾發表文章，委婉批評鄭振鐸在歡迎印度泰戈爾時的某些提法。五卅運動時，鄭振鐸與胡愈之、沈雁冰、葉聖陶、王伯祥等人創辦了一份《公理日報》，由他主編，報名也是他取的。這張報紙無疑是愛國的，進步的。但這時正在從事地下秘密工作

嫁給古米廖夫

（英）伊·范斯坦 俞士忱譯

然而，古米廖夫仍繼續高度評價阿赫瑪托娃寫的詩。1913年4月他從彼得堡寄給她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整天想着你《海邊的姑娘》的句子，它們不僅令我喜歡，還令我陶醉。」

除信守諾言之外，阿赫瑪托娃還始終忠實於古米廖夫。當地獲悉古米廖夫被齊娜伊達·吉皮烏斯和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讓人痛心打發出他們在巴黎的沙龍後，決定不加入他們那頗有影響力的圈子。她的決定甚至吸引了吉皮烏斯。

1912年4月3日與古米廖夫動身到意大利時，她已有身孕三個月，在乘船抵達熱那亞前，兩人途經柏林、洛桑和聖雷莫。古米廖夫自個兒到羅馬考察了一個星期，而阿赫瑪托娃則留在佛羅倫薩。回程途中，他們經過波隆那、帕多瓦和威尼斯，在威尼斯呆了大約十天。阿赫瑪托娃被意大利藝術所感染，她說美術進入了自己的想像恍如夢一般鮮豔。

阿赫瑪托娃母女在她的表親娜尼奇卡·茲蒙奇拉鄰近奧地利的莊園度過1912年夏天。但在將要臨盆時她回到了皇村。第一陣陣痛來得很早，她和丈夫是步行到醫院去的，因為他太慌張，竟忘了叫出租馬車或乘電車，他們在早上十點來到瓦西列夫斯基島的產科醫院，但到傍晚古米廖夫便失蹤了，而且整晚不歸。第二天他再度出現時，探訪阿赫瑪托娃的親朋已經在祝賀她生了個兒子。古米廖夫不免有些尷尬，因為他不曾在家過夜。他倆的兒子列夫（這個名字更帶感情的叫法是廖凡或廖武什卡）生於1912年10月1日。他出生不久，雙親便同意給對方以充分的性自由，並「停止干預對方的私生活」。阿赫瑪托娃對新生兒的感情是矛盾的，有人認為，她覺得難以承擔責任。不過，阿赫瑪托娃仍親自哺乳，並有一段時間不曾離家，直到把看管孫子視為樂事的奶奶答應在斯列普涅沃照料孩子。讓別人哺育自己的孩子，這在阿赫瑪托娃一類的女性中完全不罕見。但在以後，列夫卻把她的決定看作是拋棄。

回到「浪蕩狗」後，她發現生活如常進行。她的詩描寫了那兒的晚會，暗示整個社會渴望着逃避，並以此結束：

你嘴啣一個黑煙斗，煙斗的煙圈如此奇怪。我身穿一條短裙子，好顯示勻稱的身材。

窗子老是被緊緊盯住，那是什麼？霧凇或雷電。你的眼睛就像貓兒那小心翼翼的雙眼。

噢，我的心多麼痛苦！它在守候死辰的臨臨，而此際在這兒跳舞的一定必陷身於地獄中。跳舞的女人肯定是奧爾加·蘇捷依金娜，阿



是她首次獲悉這種特別的風流韻事。人們不能不懷疑她婆婆想讓她知道這件事。雖然她和古米廖夫已經同意給予對方以完全的性自由權利，阿赫瑪托娃也高傲地排斥任何妒嫉的感受，但他在外國期間，她仍不會給古米廖夫寫過信。他回國後，兩人重逢，她以女皇般的姿態把在抽屜裡發現的情信交给了他。無論她的舉止是多麼的大方，他背叛的私通細節還是傷害了她。葉甫蓋尼·萊因堅持阿赫瑪托娃不心存妒嫉，因為她不要古米廖夫，蔑視她遭受的個人羞辱。

1913年10月13日，古米廖夫與梅耶荷德劇院的女演員奧爾加·尼古拉耶夫娜·維索茨卡妮生了個兒子，取名奧列斯特。阿赫瑪托娃在日記本上記下這件事，但補充說事情與她毫無關係。阿赫瑪托娃和古米廖夫繼續一起在「浪蕩狗」露臉。古米廖夫並不因奧爾加而感到有所約束，他與詩人格利戈里·阿達莫維奇的妹妹娜塔利亞·阿達莫維奇又傳出了緋聞。

1913年秋，阿赫瑪托娃寫下一首重要的詩作，由於最後的詩節是認識她的生活和詩歌開始賦予她以力量的中心，因此必須作為自傳體來閱讀。詩作是這樣開始的：

熱戀中的總有諸多要求！

不再愛的啥要求也沒有。

她繼續建議情人保管好她的信件，只要它們有助於理解他本人的經歷。在她死後，學生們一旦捧起詩集，她的慰藉就浮現在心頭：

唉，獲悉淒慘的故事，

讓他們狡詐地一笑……

愛情不再給我以平和

只給我以痛苦的光榮。

就在1913年行將結束時，阿赫瑪托娃開始過着獨立的生活。12月15日，她帶着書去訪亞歷山大·勃洛克，請他在書中題字。在其中兩冊他只簡單地寫上：「致阿赫瑪托娃——勃洛克」。

第三冊他寫上一首獻給她的情詩。阿赫瑪托娃把該詩形容為讓她保持距離的方式。伸出他的巴掌，作一個擋駕的姿勢，它似乎在說：別碰我。雖然勃洛克有女性的情人的名聲，阿赫瑪托娃透露，甚至試圖誘惑他的蕩婦也難以成事，因為在「最後一分鐘他會推開她們」。

（四）《阿赫瑪托娃傳》第三章

《黃心大師》中的詩詞

□劉效禮

施鰲存先生於三十年代初，以擅寫心理分析小說響滿文壇，獨步大江南北，開創了中國新文學中影響深遠的新感覺派。

他的意識流小說純然地運用奧地利精神分析大師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理論，以錯綜紛繁的內心獨白、自由聯想、夢幻、象徵等現代主義的各種創作手法，頗為完美地實現了中國小說由傳統敘事文體向現代小說敘事方式的轉變，進一步促使中國現代小說與國際文壇發展的融會貫通，海內外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者稱譽他為中國現代小說的開創者。

施鰲存自三十年代中期起，又在他的小說創作中致力於西方現代主義與中國本土文化的會通結合，融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於一體。他力圖「創造一種純中國式的白話文」，即「評話、傳奇和演義諸種文體的融合」，「希望用這種理想中的純中國式的白話文來寫新小說，一面排除舊小說中的俗套濫調，另一面也排除歐化的句法。」從而在探索實踐中創作既能運用現代主義手法，又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小說。

一九三七年三月，施鰲存以「半文言半白話」、「近乎來人詞話文體」，又全篇運用意識流心理分析手法的新作《黃心大師》，成功地塑造了「嘗為官妓」的惱娘，皈依佛門後成為不論僧俗眾所欽仰的一代名尼「黃心大師」的極為鮮明生動富有個性的形象，當即受到廣大文藝愛好者，著名作家、學者許杰、朱光潛等，以至佛學宗師、一代高僧震華法師的高度評價。

施鰲存在《黃心大師》中，敘述惱娘於南宋嘉定十二年四月八日在南昌城外妙住庵裡被剃為尼，「其時壇壝紫清真人白玉蟾方訪道入浙，留滯南昌，聞知其事，大為嘆美」，即書贈黃心方丈（惱娘甫出家，妙住庵方丈即授她法名「黃心」，並命她「繼為當家師」）一首七律和一首《滿江紅》詞：如今無用繡香囊，久已空王運佛場。生纖骨樑三事衲，冷灰心鑪一爐香。庭前竹長真如翠，檻外花開般若香。萬事到頭都是夢，天傾三峡洗高唐。

豆蔻丁香，待則甚、如今休也。爭知道、本來面目，風光灑灑。底事到頭驚風俗，不如彈脫鴛鴦社。好說與幾個正迷人，休嗟呀。

紗窗外，梅花下。酒醒也，教人怕。把翠雲剪卻，繡衣披掛。柳絮已參鶻勒了，趙州要勘台山話。想而今心似白芙蕖，無人畫。

《黃心大師》其後成為施鰲存小說創作系列中的名篇，其後也頗有施鰲存小說的愛好者和研究者，以為《黃心大師》既為施鰲存的小說家言，那充滿佛理禪機極為高妙的七言律詩和《滿江紅》詞，實也應為施鰲存所作代作，以致有研究者以此一詩一詞作為施鰲存文學創作歷程的思想資料。

有此誤解的研究者，可能忽略了施鰲存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撰寫的《一個永久的歉疚——對震華法師的懺悔》，此文於此年除夕刊於《申報》副刊《文學》第五期（亦收錄於《施鰲存文集·北山散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施鰲存於此文起首即寫道：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間，我買到了一部明初羅仙刻本《白玉蟾集》，讀了其中贈陳章尼黃心大師的一詩一詞，不禁遐想。頗欲知道這黃心大師的詳細事跡，可是找了一些書，也竟找不出來。但即從詩詞的辭氣看來，從那詞題下註的「嘗為官妓」這句話看來，也可約略揣測其人了。既無載籍可考，何妨借它來作成題材，演寫我的小說。

至於這篇小說裡的故事，百分之百是虛構的。我在篇中曾經提起過有一個藏書家那裡看到了無名氏著的《比丘尼傳》十二卷的明初抄本殘佚，以及明人小說《洪都雅致》二冊，並且也曾引用了此二書中幾段關於黃心尼記載，其實全出於偽造，正如莪相之詩與梅暉的《古文尚書》一樣。

據此可知，《黃心大師》此篇小說實為施鰲存的「小說家言」，但其中也有少許確鑿的史料。而白玉蟾確為實有的宋代高士，此一詩一詞也確為他所撰作和題贈黃心大師。

不過施鰲存在《黃心大師》中也確為此篇中人物代作過半首詞：「曾經有過一個年少風流的詞人，給惱娘賦了一首《浣溪沙》，其句曰：『明月哪堪容易缺，好花爭奈不禁秋，惱娘心事古今愁。』惱娘一見此詞，不覺破顏微笑。」

爰作此文，以正誤說。今年為施鰲存先生逝世五周年，也以此小文以作紀念。